

#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第二届“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前沿论坛”研讨会综述

王修华 彭德荣 李万利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新时代新征程，亟须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作出了关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所作出的重要创新性论断，为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引。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实践规律和发展路径，增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化与体系化研究，以有效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助推作用，由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与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前沿论坛”研讨会于2024年6月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顺利举行。来自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等全国3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襄学术盛举、淬炼思想火花，共同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与方案。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方颖教授与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擎教授依次做了题为《解构新质生产力：一个分析框架》《资本市场长期信息反馈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金融强国建设》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结束后，会议进入圆桌论坛环节，湖南大学马理教授作为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董青马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刘西川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谭小芬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熊德平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张龙耀教授与中山大学曾燕教授作为嘉宾，围绕“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与讨论。本届论坛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与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绿色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金融创新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新质生产力与消费促进”八个平行分论坛，点评专家与论文作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碰撞出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思想观点。现将与会专家和会议论文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

##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形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征程需要构建发展新引擎、塑造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准确、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本届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什么，新质生产力究竟如何形成，以及怎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中国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与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更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阐明了其丰富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①</sup>。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罗必良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体系的核心是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三大催生因素中，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则是颠覆性技术采纳与渗透的结果。

### （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

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何而来？颠覆式技术创新、采纳及其渗透是如何实现的？针对这些问题，罗必良在“凡勃伦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三项本能×三类主体×三大催生”的分析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深层次逻辑。他认为，思想家与科学家受“求知本能”的驱动，在思想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企业家群体受“功利本能”的驱动，在企业家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达成要素创新性配置；政府受“亲善本能”的驱动，在国际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该分析框架中，思想家或科学家、企业家与政府三大主体并非独立运作，三者之间有重要的互动。同时，他们彼此之间良性互动而形成的创新生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且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空间。

###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1. 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特征，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中，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专精特新”企业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补链的重要一环，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厦门大学蔡庆丰和舒少文研究了“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创新激励效应，指出地区“专精特新”企业

<sup>①</sup>参见《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https://www.gov.cn/yaowen/licbiao/202405/content\\_6954761.htm](https://www.gov.cn/yaowen/licbiao/202405/content_6954761.htm)。

认定会引起所在城市占行业主导地位的上市企业产生“应激创新”反应，且在推动同城占行业主导地位的上市企业专业化发展和同产业链上的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地区的创新质量，进而助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颖从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阐释了资本市场在服务绿色创新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揭示了资本市场长期股价信息含量可以改善企业管理层信息决策环境和增强耐心资本对管理层长期项目的监督强度，从而降低创新的谨慎性门槛，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2.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颠覆式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塔里木大学欧阳金琼和魏德强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维度测算了中国省级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发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路径，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财政安全是最具底线意义的安全。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保障是保障财政安全的关键一环，是实现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暨南大学谢宝剑和苏涵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财政收入与降低负债水平来提升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水平，且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临近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水平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

3.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如何更好地推动有为政府“看得见的手”和有效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厦门大学黄寿峰和邓宇铭指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企业税收负担和转变财政支出偏好，显著地加剧企业资源错配程度，扭曲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需要统筹协调目标责任制与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数字技术在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以及延伸产业链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流动。安徽财经大学钟娟、湖南大学丁怡帆和安徽财经大学魏彦杰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客户配置多元化的影响，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能够优化客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对少数大客户的过度依赖，有助于企业构建多元化的客户基础和灵活可控的客户网络，从而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此外，小微企业作为最具创新与活力的微观主体，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西南财经大学唐莹和刘雨琴通过构建小微企业组织韧性测度指标，发现企业家多元化职业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小微企业组织韧性，促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4.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地方都市圈发展模式正逐渐成为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在打破行政分割、构建一体化格局和促进市场融合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南大学陈熠辉、杨青和蔡庆丰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发布的都市圈发展规划文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市场融合发展模式能够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并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从而推动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培育发展区域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都市圈等较发达地区，而且需要关注中

西部省份等广大的相对欠发达地区。以区域协作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是实现先富帮后富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西北大学王寿彭和吴丰华基于对结对帮扶政策的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通过产业升级、资金支持、人力资本积累等路径，显著提升了受帮扶县的经济韧性，尤其对非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业主导县和革命老区县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此外，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强的难题开辟了新路径。山东财经大学张艺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加速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县域创业活动来提升县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且这种影响会因所在地区的自然地貌、工业基础以及财政扶持力度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差别。

5.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指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提升绿色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湖南大学周颖、方子怡和喻旭兰基于重污染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视角，发现在绿色信贷政策的规制压力下，银行信贷供给意愿降低，同时企业环境投资行为增加，重污染企业被迫采用短期负债来滚动支持其环境项目投资，导致投融资期限错配，并加大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这为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释放绿色金融的积极势能，促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支撑。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新的质变与跃迁，其形成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配的生产关系变革。金融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强大的金融体系不仅关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将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壮大。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技术的创新研发与成果转化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离不开金融的支撑。促成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亟须壮大耐心资本，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持续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 （一）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础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科学阐明了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赋予了金融系统以金融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使命。王擎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强国往往先于金融强国，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都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面对当前系统性挑战、周期性挑战与结构性挑战“三大挑战”压力，务实发展经济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要求，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主线，其着力点是塑造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理论自信，健全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走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追求，坚定服务国家战略与薄弱环节，牢牢把握自主可控的发展路径，保持稳中求进的运行基调。王擎还强调，金融强

国关键在人，金融强国的“六个强大”中，建设强大的金融人才尤为重要。

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服务新质生产力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圆桌论坛六位嘉宾围绕“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关于金融如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董青马认为，金融业应持续推动减费让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通过金融创新降低实体企业科技创新的边际交易成本，以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针对当前金融服务供给与创新融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谭小芬认为，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海外投资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国内创新提供资金供给，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加强与中葡基金、丝路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的沟通协作，推动资本跨境流动等方式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燕认为，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健全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完善各上市板块的上市标准、评价标准与退市制度，保障融资企业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在体系构建上，需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资本市场与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实体企业科技创新资金需求的适配性；在对外开放上，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利用好港交所与深交所两个平台。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体现出中央层面对数字金融的高度重视。熊德平认为，数字金融可以基于其共享、便捷、低成本与低门槛的特质与传统金融形成有机互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来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效率性，助力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为科技创新注入动能。关于农村金融如何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刘西川认为，要紧扣农村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技术创新能力弱的现实，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张龙耀指出，农村金融机构规模较小、实力较弱、风险较高，要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明确农村金融机构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方向，为服务新质生产力打下坚实基础。他同时指出，当前中国农业科技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且相对不足，要充分撬动企业资本、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多种资本来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普惠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彰显了“金融为民”的价值取向。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业支持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体现，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促使更多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强调满足“三农”、小微企业等群体的金融需求。长期以来，融资约束一直是“三农”实现内源式发展的关键障碍，而“金融抑制”造成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被认为是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湖南农业大学刘波、石硕和向玉冰通过检验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发现，县域银行业竞争度的提升能够缓解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但从需求类型上看，仅能缓解农户需求型融资约束，并不能缓解供给型融资约束。因此，需要在保持县域银行业适度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湖南大学王修华、欧阳佳俊和刘锦华基于“资本市场县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资本市场服务下沉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

资本市场服务下沉能够助推农业经营主体壮大、拓展农业产业链，并加速“以工带农”，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且这种正向效应在经济水平较低、财政收入水平较低以及居民存款储蓄水平较低的县域地区更为明显，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下沉的普惠性特征。

为实现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监管部门持续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然而，当前贷款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银行净息差也呈现不断收窄趋势。西南大学吕政和王子奇基于合意息差视角，针对部分大型企业为了投机套利，低息贷款、高息存款的企业金融化行为，系统探讨了如何通过利率自律机制，既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又保证银行业合意的存贷款息差，以便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他们指出，可以通过利率自律的市场化改革，疏通中国利率传导机制中存在的堵点，矫正政策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之间合理利差的阶段性偏离。由此可避免市场资金价格存在不合理的倒挂问题，有效压缩套利空间，从而提高银行贷款向实体经济的转化效率，促进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

###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薄弱领域：农业农村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当前，中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最大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生产的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治理的现代化是发展保障。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与可持续特征，有助于锻造高素质高技能农业农村人才，推动传统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重塑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固夯实农业农村基础，着力于弥补农业生产现代化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不足，立足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产业发展、优化生产组织形式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着眼于优化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多主体的治理参与，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 （一）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

1.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障粮食安全，重在加强耕地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牢牢坚守耕地红线，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坚持“藏粮于地”与“藏粮与技”并重。湖南大学侯俊军、李宁慧和广西大学龙花楼以湖南省为研究样本测算农业新质生产力，并分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空间利用的影响。他们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空间利用具有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即在一定时期内，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生产空间的利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推动农业技术扩散与农业生产方式变革赋能农业生产空间利用转型，且受地形地貌状况与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增多已成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为确保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农业生产因集聚能力弱、生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受到气候灾害的冲击更为严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在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煜阳、陆迁和李家辉基于甘、陕、晋三省 1188 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探讨了灾害冲击对农户是否以成员身份参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和参与程度的影响。他们发现，受灾害冲击越严重，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以成员身份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且参与程度更深，其中，信贷约束、劳动力配置与销售稳定性是关键作用路径。湖南大学张宁、杨瑾和毕达宁分析了冬小麦产量与气候因子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引入天气因子的时间序列模型能够大幅提升小麦产量预测精度，而预测协调整合模型可以实现冬小麦产量在多层次预测体系中的核算平衡。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使用最佳模型进行产量预测，并注重气候因子与风险区划的深度融合，发挥农作物政策补贴的防灾稳产作用。

2. 培育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打造乡土特色品牌，是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浙江大学罗诚、北京大学杜语和夏雨等考察了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发现建立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营业收入，尤其对参与产业链延伸和多功能拓展型的主体，以及从事主导特色产业且位于产业链加工制造、流通环节的主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西南财经大学牛耕、刘灿和向雪凤等基于“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乡村特色产业的信贷约束，使更多乡村企业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提高了乡村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其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从而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做大做强农村特色产业，关键在发展特色，核心在提升农产品质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家辉、李晗和李煜阳等以猕猴桃市场为例的研究发现，产品质量认证是治理农产品“柠檬市场”的有效手段，其中，有机农产品认证对农产品“柠檬市场”的治理效果最优，绿色食品认证次之，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最弱。随着产品质量认证程度的加深，产品治理认证对农产品“柠檬市场”治理效果也不断增强。

3. 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优化。作为传统生产力的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组合优化，有助于推动传统的、低质量的农业产业形态向现代的、高质量的农业产业形态发展转化。上海财经大学赵鑫、吴方卫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秦国庆探究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农业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动力，农业现代化又是生产力由“旧质”演化为“新质”的现实过程。因此，推动农业现代化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打造新质农业劳动工具，以人才为基础培养新质农业劳动者，通过培育新质生产资料来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以产生新质生产结构。数字经济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渗透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进程，为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新机遇。北京物资学院郭沛瑶、章睿妍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尹志超分析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对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影响，认为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有助于促进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小农家庭与农村产业化发展的深度联结。因此，需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趋势不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优质劳动力缺乏问题较为突出。暨南大学甘雨、西南财经大学朱杰和王军等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影响，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呈现“逆生命周期”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发挥生产效应、生活效应和生态效应促使35岁青壮年农业转移人口向农村回流，实现在家乡就地就业与创业，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4.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其特点是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农业数智化发展为手段，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标志。山东财经大学于新亮、任丽颖和王琦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嵌入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出农业新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他们基于2003—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使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计算村级层面嵌入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新质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具有显著驱动作用，且这一驱动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来发挥效用。推进农业数智化发展，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条重要途径。东北财经大学贺玉检验了各地区不同农业数智化发展水平下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农业数智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存在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较高的土地流转率，农业生产数智化对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进而加速了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 （二）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1.优化能人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和保障力量。“能人”治村是村民自治制度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迁的典型实践，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然而，也需要关注能人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中山大学刘洋和朱亚鹏基于自组织治理的能人效应理论，考察了“能人”治村与村庄民主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他们发现，“能人”治村能动员村民集体的自我组织，激活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效能。但是，“能人”长时间治村可能形成对村庄公权力的垄断，进而异化村庄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机制，使自治组织渐趋层级化，最终形成寡头治理结构。因此，在将“能人”治理融入乡村现代化的基层治理过程中，需要把握“效率”与“民主”之间的平衡，既要释放能人治理的治理效能，又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发现为构建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及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益启示。

2.鼓励女性参与治理。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趋势下，农村常住人口呈现老龄化与女性化特征，充分发挥女性基层治理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新动能，且女性“共情、细心与耐心”等特质也有助于构建乡村治理中的柔性机制。在数字化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为女性参与乡村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西南大学王小华、彭帮容和邹宝玲检验了数字能力对女性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发现数字能力显著提升了女性的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其中，数字接入和数字认知维度对女性乡村治理参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数字使用维度，且对女性权力参与的促进作用超过对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西南大学经何茜、黄佳洁和温涛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发展能力的影响。他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发展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女性群体的赋能；对于中西部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个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这些研究，对促进女性发展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一方面，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前提，而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动能、催生出的新产业有助于做大做优“蛋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全面、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而其中所蕴含的“共享”理念必然要求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模式、构建的新机制有利于分好分匀“蛋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重点关注落后群体收入问题，防止脱贫人口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促进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也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因此，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把握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以新的生产力发展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新的数字业态繁荣促进农户增收，并着力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与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贫困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返贫风险依然存在，提升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是防止返贫风险发生的重要举措。西南大学刘正桃、温涛和王小华基于农户数字能力的视角，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农村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他们发现，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提升绝对贫困标准下农村家庭发展韧性，而只有考虑农户数字能力后，网络基础设施才能提升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农村家庭发展韧性。同时，在考虑农户数字能力后，网络基础设施对西部农村家庭、脱贫户的发展韧性提升更显著，能够缩小农村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发展韧性差异。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就需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大批农户需要转产就业，生计转型可能引发农户的返贫风险。上海海洋大学汪雪铭和郑建明将生计恢复力理论运用到长江禁捕的政策情境与退捕渔民增收实践中，基于湖北、湖南和贵州三省沿江脱贫县渔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渔民生计恢复力对不同就业行为的增收影响。他们发现，渔民生计恢复力对务农就业转产与非农就业转产的增收程度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对务农就业增收而言，自然资本的边际效应大于人力资本；而对非农就业增收而言，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边际效应最大，人力资本次之，自然资本边际效应最小。因此，需要科学制定针对转产就业的帮扶政策，以巩固渔民安置保障成果，帮助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 （二）强化数字赋能农户增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其关键在于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农村电商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数字经济催生下的新业态，已成为助力农户持续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山东农业大学张美玲、徐宣国和张复宏等利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农村电商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因此，可以借助新质生产力不断挖掘农村电商的创新潜力，从而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西南大学陈肖雄、南京农业大学郜栋玺和张龙耀考察了政务服务信息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政务服务信息化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和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因此，推动政务服务在全国进行信息化转型和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实现共同富

裕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改革方向。此外，数字技术赋能的乡土文化资本正在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与促进农民增收的“最大增量”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秦小迪、王皖俪和吴海涛探究了乡土文化资本和数字技术等多动力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式与协同效果，发现仅靠增加乡土文化资本本身，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只有在数字技术赋能后，乡土文化资本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进而助力农民增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促进农户增收的另一重要渠道，但现实中农村土地非农化双轨制局面，即土地征收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并存，致使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分配矛盾渐趋复杂。湖南大学王斯亮和中山大学刘洋发现，在征地轨道内，农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国家份额远大于农民集体份额；在土地入市轨道内，由农民集体主导的农地的增值空间已接近甚至超越由国家主导的征地轨道，这种地权结构失衡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在征地与入市两个轨道、国家与农民集体两个主体之间的分配均呈现不平等，农民集体财产权益、政府土地财政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局面没能形成。

### （三）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1. 缓解消费不平等。相较于收入和财富，消费不平等更能直观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是稳中求进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亟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户消费不平等却日益凸显。华南农业大学谭卓敏、徐伟祁、陈楚娜等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机会不平等理论，考察了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发现金融科技下乡可以有效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现状。一方面，金融科技下乡可以通过优化农村支付环境、信贷环境及社交环境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下乡能够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金融素养积累缩小农户消费差距。另外，金融科技下乡还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特征，有助于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消费差距以及缓解低禀赋农户消费相对薄弱程度。因此，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下乡，是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进而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2. 释放消费潜能。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应该涵盖居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需要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极力提振消费信心以提升居民的消费满足感。华南农业大学陈霄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发现农村土地确权仅能促进农户生存型消费的增加，无法实现对发展型消费的提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已有习惯与信息进行消费决策。以膳食消费为例，农村居民膳食的强习惯性是影响居民膳食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改变这种已经固化的膳食习惯仅依靠提升收入水平等外部手段是不够的。东北农业大学丁爽、李春雷和王刚毅基于习惯形成理论，从外部习惯的示范效应视角，考察了外部膳食习惯对农村居民膳食质量的影响。他们发现，良好的外部膳食习惯通过塑造居民膳食偏好、削弱内部习惯性和优化食物摄入结构等多元化路径提升农村居民膳食质量。

3. 推动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指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生活方式，是消费质量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泽贤、万亮和郑桥桥等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家庭碳减排的影响，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形成绿色生活方式，降低家庭日常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环境意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新质生产力对家庭碳减排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

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引导居民清洁消费，并确保其不增加过高的消费成本，是实现居民绿色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因素。浙江师范大学周宇欣和朱荣军基于居民能源消费角度的研究发现，居民能源消费偏向清洁能源不仅有助于空气污染治理，而且有助于提升居民的身体健康，且不会因清洁能源消费偏向而增加居民的能源消费成本。绿色宜居消费是否会引致过高的消费成本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湖南大学马理和桑迪从房地产市场出发，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绿色调控政策的环境治理效果和对房价的影响。他们发现，约束型绿色调控政策（如基于碳排放量征收的税费制度）有利于环境治理，但是存在成本传导机制，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然而，激励型绿色调控政策（如低碳补贴制度）能够较好地改进调控效果，在追求宜居环境的同时保持稳定的房价预期。

##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前沿论坛”是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搭建的、面向经济学管理学全领域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理论前沿问题与重要实践问题的深入探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孕育卓越的研究成果、贡献优秀的思想智慧。本届论坛会聚了学术界权威专家与国内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形成逻辑和实现路径，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薄弱环节和价值追求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形成诸多有益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与会学者基于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辨析，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两者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与发展要求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部分学者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框架提出城市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及农业新质全要素生产率等衍生概念。在实证上，学者从家户、企业、产业、区域经济等多角度、全方位分析新质生产力框架下技术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问题，还有诸多可以进一步探讨之处，包括但不限于：其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测度。精准地测算与衡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分析影响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其二，科技金融融合与新质生产力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探究如何有效发挥科技金融的引导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降低创新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人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而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转变人口压力为人口红利、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责任编辑：小林）